

国家与个体的双重边缘处境 ——“入关学”的不满情绪及其困境

傅正

一、来自“问鼎学”的挑战

2020年2月初，中国人一下子知道了一个叫作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美国外交学家。此人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亚洲病夫》的文章，因而受到了中国外交部的点名批评。米德在文章一开头就幸灾乐祸地说道：“这个强大的中国神像本周被一种跳跃的蝙蝠病毒击倒。”然后米德开始大摇大摆地预测起美好的前景了：

预测人士估计，冠状病毒疫情最有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是，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将短暂大幅下降，并随着疾病的消退而复苏。最重要的长期结果似乎是，全球企业供应链的“去中国化”（de-Sinicize）趋势将得到加强。

这番话当然是在配合美国政府：疫情会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美好愿景之后，米德又毫不令人意外地攻击中国，内容无非是重弹“中国崩溃论”老调。

当然，事实很快证明了，真正处于危机边缘的脆弱国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自己。声誉扫地的不只是美国的决策者和千疮百孔的医疗体系，而且是美国政府的愚民政策，更是西方思想界、舆论界盲目自大、编造学术谎言的行为。

米德不是天然的反华派，他之所以揪住中国不放，乃是出于美国对华“新冷战”的需要。米德曾经有一篇题为《北京升级了新冷战》的社论，其中引用了“楚庄王问鼎中原”的典故。他说道：“占统治地位却日渐衰落的周王朝在其宫殿中保留了象征拥有天命的大型礼器。崛起中的楚国统治者询问周朝传人，这些大鼎有多重。……所有政治阶层的美国人都注意到，北京正在询问我们的大鼎。”^①用我们的网络语言说，米德也提出了一门“问鼎学”。

问题是我们的学术界并没有相应的说法，反而是民间草野有了一门“入关学”。

二、“入关学”的争议

最近“入关学”红遍了网络“键政圈”。相关争议层出不穷，褒奖者有之，贬斥者亦不乏其人。

例如“青年力”公众号发表评论《五四青年节，谈谈“入关学”》。评论指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当代青年有着更强烈的民族自信和爱国热情。“入关学”乃是这种爱国热情的“有指向性的情绪性发泄”。但这种情绪性发泄是积极的，它主要针对两个敌人：“外在的帝国主义霸权和精神文化殖民，内在的一些‘带路党’‘恨国党’的肆意妄言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污蔑。”从根本上说，“入关学”是一个缩影，它预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话语将随着代际而更替，“此时，

^① W. R. Mead, “Beijing Escalates the New Cold War”, *Wall Street Journal* (Eastern edition), Mar. 19th, 2020, A.19.

旧有的启蒙主义式的历史叙述框架已经容纳不下新的内容了，甚至已经腐朽堕落为新文化新思想精神的阻碍。旧的普世价值‘自由，平等，人权’的倾覆，对新的文化价值体系的呼唤，这得先重述（重塑）历史叙事”。^①揆其所论，尽管“入关学”在形式上是粗糙的，在学理上是匮乏的，但在精神上却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新生事物总是“粗鄙不文”的，但这完全不妨碍它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青年力”代表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正如一篇普及文章《什么是“入关学”》便以赞许的口吻指出：“我们不难发现，人民群众所最熟知的历史人物，几乎都来自于评书、戏说与传说，例如三国、水浒、封神、隋唐演义，诸如此类；而‘入关学’采用了类似的叙事模式，将国际形势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解构，这样就达到了科普与教育的目的。”作者在文章结尾处满怀期望地说道：“曾几何时，建州人觉得，我们应该依附于大明，和大明成为夫妻，这样就可以和大明和平共存。可现在，建州人觉得，得到大明认同并非那么重要——只要我们取代了大明，那么我们自己就是大明。”^②

与上述褒奖的声音相反，许多人批判“入关学”含有太过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是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反映。“入关学”以女真或八旗隐喻中国，以大明隐喻美国和西方世界，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以掠夺和战争的方式取代美国的地位？朴素的关外女真民族武德充沛、斗志高昂，文明的大明王朝却腐化堕落、文弱不堪。这样的比喻不禁令人想起了80多年前的日本军国主义史学家宫崎市定。有学者就敏感地指出：“宫崎的基本假设与入关学十分类似——它们都将所谓‘野蛮民族’放在更加中心的地位，相信只有带有朴素主义色彩的文明才能称霸世界，推动历史发展。相比之下，所谓的文明社会，则受到各种社会积弊的影响，注定走向衰落。”他十分担忧地指出：“这样的思想，走到极端，很可能成为一味强调‘先为力胜’，鼓吹野蛮战胜文明，暴力赢得一切的极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甚至进一步激化为法西斯思想。”^③

甚至有人索性将“入关”比作当年昭和 Japan 发动太平洋战争。该文章在结尾处坦言：“眼下的中国绝无可能与美国直接叫板，在可预见的未来也没有以一己之力彻底摧毁旧有国际秩序的能力。‘入关’若只是口嗨还能理解，若是落实为与美国全面对抗，主动‘脱钩’甚至放弃扩大开放和外交斡旋的努力，必然会比西方承受更多的痛苦与损失，走向混乱、动荡。”^④作者无疑认为，“入关”就意味着军事对抗、全面脱钩，甚至闭关锁国。当年清军“入关”不就是为了掠夺或占领吗？

上述两派各执一词，立场截然相反。仍有另一派选择了看似超然的态度，对“入关学”进行简单的阶级分析。比如有人就说，“入关学”的实质就是向外转移内部矛盾：“相对于中国的工人阶级，中国的小资产阶级面临着更巨大的压力，他们已经感受到了资本集团对他们进行收割的

① 青年力编辑：《五四青年节，谈谈“入关学”》（2020年5月5日），“青年力”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tc9fFYh63pCheTcrPZ4T2w>。

② Ezawa：《什么是“入关学”》（2020年4月12日），“烧脑CPU”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_VZRcKqcOYqJXp_CIZXV7Q。

③ 邢麟舟：《评入关学：极端自我对象化及其风险》（2020年4月26日），“无隅”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ZZOemG4p6FIBFmwX7mf73A>。

④ 江北烟雨人：《昭和 Japan 悲剧在前，中国莫被“入关学”所欺》（2020年4月23日），“烟雨舟横”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QCTg4yuYFP3M1TfPJ44luQ>。

危险了，从而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意图对资本集团的行为方式进行影响。”^①在这一派人看来，“入关学”是网络“小粉红”的情绪性宣泄，认为它是小资产阶级无力改变受剥削状态时的必然反应。如其所论：“他们意识到了资本集团的压制，但是他们没有勇气与之直面，他们更希望通过入关这一转移矛盾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经过计算，似乎与外界为敌成本更低，自己不用付出直接的损失。但随着逆全球化和对立的加剧，恐怕这一想法会完全落空。”^②

以上三种说法，或是高度赞扬“入关学”反映了新时代青年的民族自信，或是批判“入关学”实为极端民族主义的喧嚣，或是看似公正地将其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这三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不认为“入关学”是一门真正的“学”。或者说，“入关学”虽有“学”之名，却是一种情绪性表达，缺乏起码的理论严肃性。

令人好奇的是，假使换个方式表达“入关学”及其2.0版的“翦商学”，比方说叫它“皇太极现象”“周文王法则”，再找几位名学者进行背书，我们还会觉得它只是一种情绪性宣泄吗？不要忘了，学术界还流行一种称为“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为什么没有人会觉得“修昔底德陷阱”只是一种情绪性的宣泄？

即便“入关学”只是情绪宣泄，但这种情绪得到广泛传播的结构因素是什么？它是否有可能转化为正规的理论学说？

三、“入关”的情绪对象

我们需要将“入关学”作为流行文化现象加以考察。一种文化现象能够流行起来，至少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它有足够简洁且足够流行的术语系统，既能让人有兴趣了解，又能让人一下子记住；二是它有比较稳定且比较广泛的受众群体；三是它有明确的针对对象，并且对该对象的不满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共识。

关于第一个条件，在《东方学刊》组织的“入关学现象”讨论会上，马逸凡、姚云帆两位学者的文章已经做了出色的论述。他们或是通过对比其他流行网络语言，或是通过对比时髦的电脑游戏模式，严肃分析了“入关学”为何能够迅速为青年人所理解和接受。^③

关于第二个条件，即稳定且广泛的受众群体，前引邢麟舟《评入关学：极端自我对象化及其风险》、赫广达《入关、翦商与“逆全球化”》、艾尔文团长《中产青年的纠结：入关学背后的利益分析》等文章都宣称“入关学”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焦虑情绪——既不满于分配不公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又无力改变现状。然而小资产阶级已经长期存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更早属事实，为什么“入关学”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偏偏在此时出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简单教条不足以解释当今复杂的文化现象。事实上，即便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也不存在这样机械的教条。恩格斯晚年的“合力论”已经说明，具体历史事件的发

^① 赫广达：《入关、翦商与“逆全球化”》（2020年4月20日），“从大地到星辰”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Th2QJLtxQeCqo_nqBpi8JQ。

^② 艾尔文团长：《中产青年的纠结：入关学背后的利益分析》（2020年4月20日），“沉思的托克维尔”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4s_vH44QJoNsBQ4RxE667Q。

^③ 参见马逸凡《“入关学”的话语生成结构及其出路》、姚云帆《从“网络政见”到“网络键政”——修辞学视野中的“入关学”》，《东方学刊》，2020年秋季刊。

生往往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之间未必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列宁的“灌输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更加明白地指出，上层建筑完全可能在现实斗争中走到经济基础的前面，推动经济基础的变革。^①

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宏大指称，几乎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并不是所有怀着焦虑情绪的小资产阶级都拥护“入关学”，不乏有人极力反对，更多人则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入关学”的拥趸并不是一个经济共同体，而是一个价值共同体。只有明确其价值纽带和针对对象，才有可能对其进行合理分析。

“入关学”有一个核心说法：“入关前不要抱着圣贤书胡思乱想，入关后自有正统儒学大师为我所用。”此处“正统儒学大师”隐喻的是那些言必称西方，处处称颂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按照山高县本人在《写给小白的入关学入门百科》中的说法：“你是一个网民，那就去抨击公知，撕开洋大人的丑恶嘴脸，唤起民智。照着公知那一套学大明是没有出路的，念经念不死大明，女真的子民们不许在洋大人面前跪。”^②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入关学”表面上说的是中美关系，但中国应该抱有何种对美政策？中国将如何改变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它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入关学”的受众群体更不可能在这些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但他们却无一例外地痛恨“公共知识分子”，反感由“公共知识分子”把持的话语权。凝聚“入关学”群体认同的核心要素与其说是中国的大战略，倒毋宁说是对“正统儒学大师”的极度不满。

比方说山高县本人曾有文章称：“某人日记英文版在美预售，我们却不敢入关捡子弹。”他接着追问道：

每次看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都感觉到很尴尬。

看到有我们自己的媒体，询问我们自己的外交部，对国外政客、国外媒体抹黑造谣的内容作出什么回应，这种尴尬和难堪的感觉就迟迟不散。

……

但不管怎么说，看看西方世界的大媒体，我们的媒体是不是做得也太少了？^③

“我们的媒体做得也太少了”，这不就是“公知”把持话语权的结果吗？

显然，在山高县及其“入关学”的拥护者看来，前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就是“公知”的典型代表。他在一篇题为《沦为政治工具的日记，对她来说局面已失控》的文章中，愤怒地宣称：

大家都是明白人，如今美国统一的造谣甩锅就是中国对美国隐瞒了关于新冠的信息，而这本书的核心内涵能对美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应该都能推测出来。

而可笑的是，会拿起这本日记，会拿起这件政治工具的美国，自己的疫情处理怎么样呢？像极了日记里描绘的那阴冷黑暗的场景。前期轻视疫情，中期混乱指挥，医护缺乏防护装备，有钱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页；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7—318页；〔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君主论》，陈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② 山高县：《写给小白的入关学入门百科》（2020年5月6日），微信公众号平台“山高县”，https://mp.weixin.qq.com/s/PhWMPEw_97oEYUaDBymNiQ。

^③ 山高县：《某人日记英文版在美预售，我们却不敢入关捡子弹》（2020年4月9日），微信公众号平台“山高县”，<https://mp.weixin.qq.com/s/K87UmJIB4T7tR3sHAJmARQ>。

人想测就测，个别没钱人被判定轻症连续发烧十几天，死了都没有得到测试。

但这本日记，这把刀却要中国来承受的，却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要承受的。^①

这是一个“内奸国贼”与“外部敌寇”串通一气的经典叙事。这番话提醒我们，“入关学”突然爆红，与《方方日记》引发的巨大舆论争议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没有像《方方日记》这样引发不满的舆论，就很难有“入关学”的兴起。两个热点文化现象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截至7月15日，一篇题为《从定体问到高喊入关，入关学的前世今生》的文章就在知乎上获得了4761个赞同。这篇文章谈的是“入关学”，却以方方女士的微博开篇。文章说道：“大众对方方这样‘定体问’型公知的老掉牙语言体系，已经产生了厌倦乃至反胃了。大家厌倦了这样的内容，更厌倦被这样的内容所代表。”^②与方方动辄乱扣几十年前的“极左”帽子，恨不得在网上狠揪“三种人”形成鲜明对比，“入关学”有思想有活力，懂得青年人的语言，能够引发青年人的共鸣。这篇文章无疑明示了《方方日记》与“入关学”具有两代人之间的差异。

几乎与山高县猛烈抨击方方同时，4月24日，有一篇题为《有些“老文化人”，其实水平可能还不如你》的文章就直白地说道：

就在这几天，我们有幸看到了几位“文化圈”的中老年人士，有支持废青的，有精日的，有恨国的。除了立场之外，关键是水平也很一般，基本上就是比较婉转的喷和立场输出。不少网友看了之后，可能觉得“这博导、教授我也当得”。（具体言论不搬运了，可去微博搜索“梁艳萍”）^③

这篇文章明言，所谓的“老文化人”其实并没有多少文化，不仅立场扭曲，知识更属浅陋，既无德又无才。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老文化人”，纯粹是借助1980年代体制转轨的便利。尽管时代的发展早已将这些“老文化人”抛到了后面，但他们却仍然把控体制资源，党同伐异。

一边代表了1980年代的启蒙热和1990年代咄咄逼人的“华盛顿共识”体系，另一边代表了2008年以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和西方社会的持续衰退。固执于前一个时代的“前浪”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成长于后一个时代的“后浪”急于登上历史舞台。“入关学”的兴起跟方方女士在年轻用户占绝对优势的哔哩哔哩弹幕网上遭到“群嘲”一样，都是这对文化矛盾的集中反映。这不只是“后浪”对于“前浪”的代际更替，更是暗示文化界的主流价值观遭到挑战，边缘价值迅速崛起。在知乎问题“如何评价知乎用户山高县的‘蛮夷入关学’”中，有篇已经获得3595个赞同的长文回答，总结“入关学”的作用不在于大战略，而在于改变网络舆论环境。如作者所言：

“笔者经过总结发现，其实入关学理论能帮助我们正确认知世界，占领舆论高地和积极应对生活。从而帮助我们更积极、更向上、更正能量。”^④所谓“更积极、更向上、更正能量”，其实折射出了我国知识精英的文化氛围长期以来“不积极不向上，充满负能量”的尴尬状态。

“入关学”兴起的宏观背景是一个悖谬的现象：中国人民对于全人类抗击新冠疫情贡献卓著，却常常遭到西方舆论的诋毁和污蔑；西方政客玩忽职守、草菅人命，却常常得到国际主流舆论的

① 山高县：《沦为政治工具的日记，对她来说局面已失控》（2020年4月16日），微信公众号平台“山高县”，<https://mp.weixin.qq.com/s/pIxrQz31pKmcQYXazla1qQ>。

② 卢诗翰：《从定体问到高喊入关，入关学的前世今生》，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120432699>。

③ 凯申日记本：《有些“老文化人”，其实水平可能还不如你》（2020年4月24日），微信公众号平台“凯申日记本”，https://mp.weixin.qq.com/s/THS5Y_TwUPmQwimywlN6bg。

④ 知乎问题：“如何评价知乎用户山高县的‘蛮夷入关学’？”，答复三，冰格公子，<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59737298>。

免责。但“山高县”们却面临着一个同样悖谬的具体生存处境：公知群体造谣生事，神化西方，却屡屡得到媒体行业的支持，成为网络公众平台上的“大V”；“山高县”们弘扬爱国主义却惨遭平台封号，不能发声。一方面是“应该主流”的自我期待，另一方面是“实际边缘”的自我认知，自我期待与现实认知之间的鸿沟构成了“入关学”不满情绪的心理根源。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遭到的无端非议更使得他们很容易将自身处境移情于国家处境，将“小我”的边缘地位与“大我”的边缘地位关联起来。

念及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入关学”会采用一种近乎极端的比喻：竟然将西方社会视为“中华”，而将中国视为“蛮夷”。非置国际主流价值于粪秽则不足以发泄这种对于国家和个人双重边缘地位的极度不满情绪：

我们作为是美国主导的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中华”正统的世界秩序中的“女贞（真）”蛮夷。不可能得到认同，任何作为都会打上蛮夷粗鄙的标签。^①

在“美国主导的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中华’正统的世界秩序”中，“女真”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无论如何作为都会被打上“蛮夷”粗鄙的标签。这不仅是中国在西方政治正确标准下的现实处境，更是“山高县”们在自由主义文化氛围中的现实处境。对自由主义文化氛围的不满乃是维系“入关学”认同的基本纽带，并且这种不满不局限于“入关学”，更普遍地蛰伏于青年学生群体当中。

另一个问题是，这种普遍不满情绪是否有可能登堂入室，是否有足够的改造空间使其成为系统的理论学说？

四、游戏化的思维模式

相比较西方学术传统，中国人更喜欢使用历史典故来讨论现实问题，而非发明新概念。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晚清政界、学界大量使用“春秋”“战国”的事例来比喻当时的国际关系。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因为当时人没有使用晦涩拗口的国际关系学术术语而否认其严肃性。这么说也许更为恰当，“盟会”“弭兵”“尊王攘夷”“行方伯之事”才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学术语。

用典之要，在理而不在事。关键是该典故要说明什么道理，而不是其事实与现状多么合拍，史实与现实本来就不可能一一对应。“崛起国”雅典是一个“民主城邦”，“守成国”斯巴达却奉行“贵族寡头制”，但这完全不意味着格雷厄姆·艾利森说“修昔底德陷阱”时，认为美国是贵族寡头国家，中国是民主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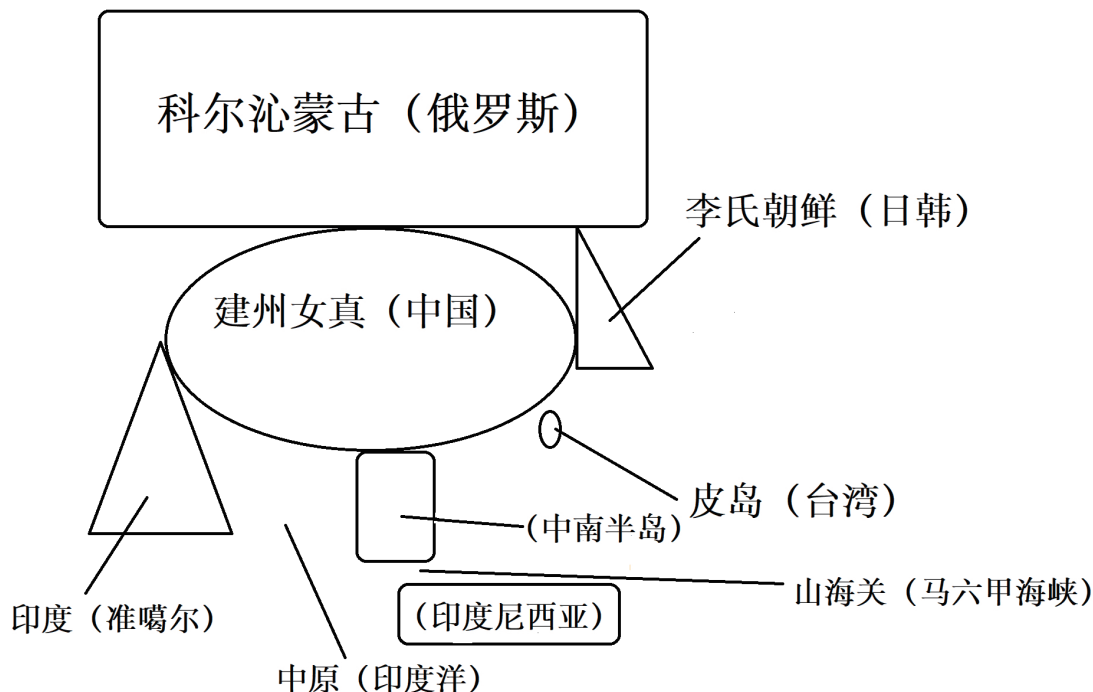
关键不在于历史上的女真做过什么事情，而在于“入关学”想用女真说明什么道理。借用时髦的学术语言，“入关”是种承认斗争，而不是自我持存斗争，它不追求彻底消灭对方，而追求获得对方的承认，真正改变自己的“蛮夷”地位。不仅如此，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之能“入关”，更大的意义在于改变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于否定了由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主导的文明标准。因此，完全可以用承认斗争学说和依附理论，把“入关学”改头换面，让它变得“很学术”“很正规”。

我们可以参照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的套路：一是把“入关”理解为某种国际关系类型，就

^① 山高县：《写给小白入关学入门百科》。

像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样；二是在历史上找到符合该类型的种种案例，统计有哪几次“崛起国挑战守成国”或者“入关”是成功的，哪几次是失败的，并分析它们各自的原因；三是提炼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框架，不仅用于分析中美关系，更可以用于分析其他同类型的国际关系。^①

然而，当我们仔细阅读山高县本人的论说，就会发现他似乎不只要言“理”，更要言“事”。以下是“入关学”常用的一幅地图。



图片为作者手绘“入关学”地理示意图

在这幅地图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科尔沁蒙古”指代俄罗斯、“皮岛”指代台湾、“山海关”指代马六甲海峡、“中原”指代印度洋、“准噶尔”指代印度……“入关学”竟不只是哲学上的“承认斗争”，更是一门关于“冲出马六甲”海峡的军事战略！用山高县本人的话说：“地缘上的入关，指的是控制南海和马六甲这世界最重要的贸易枢纽海域，以及印度洋航线。”^②

也无怪乎许多人指责山高县像昭和日本的军部参谋。他如此能耐，为什么不索性设计在中南半岛开凿一条运河，绕过马六甲海峡？或是扩充中巴铁路的功能，让新疆直通印度洋？这样岂不是连“入关”都可以省掉了？

马逸凡博士在讨论中精彩地指出，“入关学”之所以将历史事件与地缘政治现状一一附会，是因为它不自觉地代入了角色扮演类电脑游戏的套路。这使得“入关学”需要同时具备角色、道具、地理场景和战术动作等几大类要素。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就好比游戏通关，不仅需要要在“山海关”（马六甲海峡）这样的特定“关卡”才能“打出”相应的“经验值”，获得“升级”，

^① [美] 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② 复活的高县：《入关学总论》（2020年4月21日），微信公众号平台“山高县”，<https://mp.weixin.qq.com/s/1dJqHNP0gXtRQq-3oS--mA>。

更需要依次“打掉”“海西女真”（港澳）、“李氏朝鲜”（日韩）、“准噶尔部”（印度）等怪兽，才能最终与“大 boss 明朝”（美国）进行决战。^①

正是角色扮演类游戏的思维定式造成“入关学”的论述混乱，比如历史上的准噶尔汗国远离中原和山海关，但“入关学”地图却把印度洋视为中原，把印度视为准噶尔；又如清王朝在大明覆亡百年之后才消灭准噶尔汗国，但“入关学”却要先击败“准噶尔”（印度）这个“小 boss”，才能最终与“大 boss 明朝”（美国）决战。

这种乱七八糟的历史附会无疑严重限制了“入关学”普适化和理论化的可能性，却让“入关学”展现出了一幅游戏图景。也许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无游戏性，“入关学”则不足以时髦；如有游戏性，“入关学”则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游戏性和理论性很难同时具备。

更可能的是，以理论化的标准去要求“入关学”，本身就是错误的。它注定只会像其他文化热点一样昙花一现，但它反映出的问题却长期存在。正如一篇网文所说：

虽然“入关”只是一个比喻，但世界的大变局会发生在我们这代人，应该是大概率事件。遗憾的是，中国的思想界、理论界、媒体界，可能又一次要落后于走出去的工程师们、实干家们。“入关学”是亚文化，也是“民科”，但在“入关学”的核心里，有对“文人”、对“精英知识分子”的期待和呼唤，期待他们不再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附属者，期待他们交出一份对得起时代呼唤的答卷。^②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① 参考马逸凡在 2020 年 6 月 12 日《东方学刊》举办的“入关学”现象研讨会上的发言。

^② 董佳宁：《中国“入关”取代美国？全面解析火了的“入关学”》（2020 年 4 月 17 日），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dongjianing/2020_04_17_547292.shtml。